

# 林爽文起义原因新论

刘 平

This essay reexamines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the Lin Shuangwen Uprising, much of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lass - conflict determ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ci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aiwan's immigrant society at the tim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and ethnic feuds we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acilitating the uprising.

林爽文起义是清中期震动台湾、影响全国的一次反清斗争，中外学者都曾作过不少有益的探讨。但是，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对这次起义原因的论述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往研究者，针对林爽文起义爆发的原因，都是从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的角度展开论证的，但是从具体史料分析来看，土地矛盾、阶级矛盾在嘉庆以前的台湾社会并非主要矛盾，已往论者所采用的论据，多为嘉庆朝以后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林爽文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和动因。

本文认为，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的一次起义，而是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拜把结会传统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裂变，事后清政府的竭力追查和残酷镇压，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分类械斗不仅是林爽文起义的主要诱因之一，也是起义发展、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林爽文起义是台湾移民社会诸种矛盾综合运动的产物。

## 一、林爽文起义的社会背景

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sup>①</sup>。无疑，清代前中期的台湾是一个边疆移民社会，

社会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暴力在这里表现得特别充分、明显。

清初以降，闽粤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诸因素的影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渐突出。就福建而言，该地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sup>②</sup>。粤东潮、惠诸府情形约略相同。当时流泄“过剩人口”的主要渠道是向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移民。

清初的台湾，“地广人稀，萧条满眼”，但这块蛮荒之地，对于深受“山海交错”、“人稠地狭”之苦的闽粤人民来说，无疑是天堂乐土：“鸿荒甫辟，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sup>③</sup>。清前期，台湾的移民数量持续增长，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人口已由清初的不足20万人增至约200万人，一个新的移民社会开始形成。

渡台移民中包括了各个阶层的分子，“士也怀筐，农也负锄，商贾负贩而云集”，其中构成台湾移民主体的是那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其内地游手无赖之徒，重罪逋逃之犯，溷迹杂沓而并至，有业者十无二三”<sup>④</sup>。由于台湾位处边陲，清朝统治力量薄弱，这个移民社会形成之始，便显在在显露出暴力迹象。

在这股汹涌而来的移民大潮中，传统与变迁存亡相继，闽粤等地的“宗族械斗”在台湾

演变为“分类械斗”，拜把结会之风则在新的土壤上滋生蔓延。

移民们来到台湾，原来的宗族、社区界限被打乱，为了在充满危险与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存，很自然地依照地缘祖籍的划分聚居、开垦。这就是移民形成“分类”的前提，不仅省与省、府与府之间壁垒森严，就是一府之内、各县之间，也有楚河汉界之别。在台湾移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各移民集团之间的合作固然存在，但由于地缘、语言、风俗的差异，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刺激，以“分类械斗”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冲突和动乱也随处可见。

“分类械斗”的表现有异籍斗、同籍斗、异姓斗、同姓斗等形式，其中尤以异籍斗中之漳泉械斗、闽粤械斗为著。姚莹称：“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众辄数十万计。匪类相聚，至千百人，则足以为乱”<sup>⑤</sup>。每当械斗发生，“哭声遍野，火光烛天，互相斗杀，肝脑涂地”<sup>⑥</sup>。由于“分类械斗”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大，严重阻碍了当时台湾社会的发展。

当时的台湾社会还存在着大量游民，俗称“罗汉脚”，衣食不继，颠沛流离，饱受欺凌，生死难卜。为了生存、互助、防备欺凌抢窃，他们便虚拟某种血缘关系，纠集一体。传统的兄弟结拜、歃血盟誓成为他们现成的“纠合”工具；传统的小说、戏剧如《三国演义》之“桃园结拜”、《水浒传》之“义气相投”，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流播所及，竟为恶俗：“二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则焚香酌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忘，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sup>⑦</sup>。

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的兄弟结拜往往演为“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由于其中分子多为“游手游食”的无赖光棍之徒，一旦羽毛渐丰，团体内部的互助、自卫很快就演变为对外惹事生非，参与械斗、抢劫、盗窃以至树旗起事、起义等种种反社会、反政府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影响（如械斗、起义、汉番冲突、经营破产等），游民——“罗汉脚”群体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既是社会变迁、社会动乱的受害

者，又是进一步社会动乱的始作俑者。他们在社会边缘求生存的主要途径是拜把结会。

不难发现，不断加速的社会流动是台湾移民社会不断产生暴力的根源，而暴力的集中表现便是分类械斗和拜把结会。

## 二、林爽文起义是由天地会发动的吗？

以往提到林爽文起义时，我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或“天地会领导的林爽文起义”。经过检阅大量资料，我认为，林爽文起义固然在天地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林爽文是一名天地会会员，清政府自然而然地将这场起义归罪于天地会，它不仅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扑灭这场叛乱，而且化大力气追究天地会的起源，但是，天地会与林爽文发动起义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令人怀疑。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从天地会创立宗旨和严烟等人的供词来看，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的一次起义。关于天地会的起源，我同意蔡少卿、秦宝琦两位学者认为天地会由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福建漳浦县创立的观点。他们还认为“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乃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sup>⑧</sup>。问题是，作为一个“互助”团体，天地会是否从一开始就有“反清复明”的远大目标。有位美国学者说：“尽管天地会的创立者明显地使用了启示性和叛乱性的信条，而且林爽文是由一个与天地会创立者有直接联系的会员（即严烟，传他入会的是与提喜相识的陈彪——引者注）介绍入会的，但在林爽文起义时出现的‘纯粹’的天地会中，却很少见到启示性和叛乱性的东西，相反，林爽文的天地会看起来就是一个犯罪集团”<sup>⑨</sup>。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从总的情况来看，当时以天地会为代表的秘密会党平素往往对内互助、对外抢劫，两者相辅相成。

介绍林爽文加入天地会的严烟在供词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严烟于乾隆四十八年来到台湾，在漳化地方开布铺。四十九年，严烟在溪底阿密里庄遇见林爽文，往来熟识，经

林爽文本人要求，严将他介绍入会。严烟后来供称，加入天地会的好处是：“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结果呢？严烟说：“真不料他后来造起反来”<sup>⑩</sup>。等到林爽文起义军攻陷彰化，林爽文要严烟做彰化县知县，严烟不敢接受，他供称：“我因他是造反的人，不敢从他，他为我同教，没有杀我，我就逃到南路凤山县龙交地方躲避”<sup>⑪</sup>。如果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作为传会人的严烟不可能不料到；起义初期，势如破竹，正是会首一展身手的好时机，可严烟不仅不敢做知县，还跑到外地躲了起来。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曾有学者向我指出，不要忘记，林爽文起义时的许多骨干都是天地会会员。是的，从林爽文起义的前因后果来说，是起义选择了天地会，而不是天地会选择了起义。许多团体，包括初具会党性质的民间互助团体，并非从一开始就树起“反清”旗号的；秘密会社初起时，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处于秘密状态。这一点，我在本文第三部分还要论及。

第二、起义刚爆发，天地会的许多骨干及成员便“背盟”逃跑，甚至叛变，说明天地会组织并不严密，也没什么“秘密”可言。林爽文在一份告示中称，彰化鹿港之林湊、诸罗之黄莫邦等“背盟结众，抗拒我师，焚毁庄社，杀戮男女”<sup>⑫</sup>。另一份告示说：“叛匪黄莫邦等串同残官柴大纪，鼓谋煽惑尔等军民，猖狂抗拒，累害万姓涂炭”<sup>⑬</sup>。告示中将“义民”头目林湊、黄莫邦等指斥为“背盟”、“叛匪”，可见他们曾是天地会成员。清军统帅福康安曾说过：“有本系会内之人，因畏惧干连，即充当义民，随同剿贼，如义民首赖水、魏收等，俱曾入天地会……即此可知入会之人，并非全行从贼”<sup>⑭</sup>。这些天地会骨干的背叛行为，说明当时天地会的政治信条是很模糊的，对某些人而言，“互助”可以，“谋逆”就不行了。

从后来清政府在福建等地破获的案件中，我们发现，当时台湾的天地会组织十分分散，活动能量不大，一有风吹草动，便畏惧逃窜。如乾隆五十一年三月至六月，黄江珠、张番

乌、石四禄、黄让等人在台湾各地分别被人招引入会，“嗣因台匪林爽文滋事，查出天地会名目，该犯等闻拿畏惧，随各潜回内地，四散窜匿，不敢复再沿习张扬”<sup>⑮</sup>，从当时档案记载来看，这些人数量不在少数。如果他们入会之初就知道天地会组织严密，力量强大，即将发动起义，又何必闻风而逃呢？

第三、如果将杨光勋添弟会与林爽文天地会做个比较，也可为上述观点提供旁证。

诸罗县捐贡杨光勋系捐职州同杨文麟螟蛉长子，杨文麟另有亲生子杨妈世（监生），“杨光勋好事游荡，杨妈世不安本分”，但杨文麟溺爱妈世，将光勋析居，“父子弟兄，时因争财吵闹”。光勋怀忿，起意纠会树党，秋成抢割在田稻谷，“遂约素好之何庆为主谋，意欲弟兄日添，争斗取胜，因名曰添弟会。杨妈世闻知，亦起意结会树党，约向交之潘吉为主谋，并以杨光勋不肖，必致被雷击死，因名曰雷公会”<sup>⑯</sup>。七月案发，官府严厉缉拿，将杨光勋等人陆续拿获惩办。因添弟会众张烈、蔡福等人逃入林爽文居住的大里杙庄，事连林爽文及其天地会，遂“酿成巨案”。后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称：“上年办理杨光勋等案内人所称添弟会，明系即此天地会名色，而换以同音之字，意欲化大为小，实属有心取巧”<sup>⑰</sup>。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也说：“地方官将天地会字样改为添弟二字，化大为小，意图将就完结”<sup>⑱</sup>。后来论者往往据此认为杨光勋的添弟会就是严烟、林爽文的天地会。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理由是：

（1）乾隆曾在一道上谕中提到：据原福建按察使李永祺、原台湾道永福称，“原案文禀，俱系添弟会字样，并非擅改”<sup>⑲</sup>。显然，李侍尧、福康安都是从地方官的“欺蒙”积习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李永祺在最初奉旨查办的过程中，“遍加察访”，添弟、雷公二会“委因兄弟争财，彼此立会纠人，希图抢割抵御”<sup>⑳</sup>。

（2）杨光勋立添弟会时，天地会分子林爽文尚未发动起义，清政府从上到下还不知道天地会名目，地方官又何必必要将天地会改为添弟会呢？如果当时大家都知道天地会是一个叛乱组织的话，杨妈世不仅没有必要创立雷公会、自罹罪网，还可报告官府、借刀杀人，而地方

官更可从中邀功议叙。

(3)从天地会和添弟会的结会情况来看,两者也有差别。众所周知,天地会会首往往是从“敛钱”角度纠人入会的,而添弟会恰恰相反,凡入会者,“每人给与番银二圆”,杨妈世也不甘落后,凡入雷公会者,“每人各给钱五百文”<sup>②</sup>。一个是会首“敛钱”,一个是会首“给钱”,情况截然相反。

还有一件事可作参照,就是林爽文起义之酝酿、发动,在各种文献中,未见有关天地会结会仪式(如歃血、钻刀圈等)的记载,台湾学者刘妮玲也说:“林爽文事件是第一宗会党致变的个案,但是林爽文等人结会的仪式却未见记载,或者与内地天地会相去无几”<sup>③</sup>。这表明当时天地会的仪式十分简单,可能与其他会党如小刀会等的仪式区别不大。天地会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其仪式、誓词、信条等有一个发育完善的过程。

通过分析添弟会、雷公会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人们“结会树党”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严烟、林爽文的天地会也不是刻意要去发动一次起义的。有人评价说:“林爽文天地会比早一些的帮会的简单组织,已有相当的改进,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实体组织。这次起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天地会核心领导,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sup>④</sup>。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三、拜把结会传统的裂变

既然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的,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间的关系呢?应该说,林爽文起义是清前期台湾社会暴力温床的产物,是拜把结会传统产生裂变的结果,当时的天地会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主要角色。进一步而言,在农业社会里,受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影响而结成的各种名目的互助团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犯罪集团),都有可能不自觉地充当叛乱的载体。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物在社会矛盾激化、时机成熟伊始,就以启示性、救世性信条组织含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团体,或是将现成的互助——抢劫集团改造成发动叛乱的工具。无论自觉与否,政府的镇压往

往成为叛乱发生的直接导火线。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是对当时台湾的拜把结会传统与林爽文起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前面谈到,闽粤两省与台湾有着十分密切的地缘、血缘关系,闽粤地区的许多恶习如宗族械斗、拜把结会在台湾找到了变态发展、再生蔓延的土壤。

拜把结会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拜把比较原始,结会则是拜把的发展,两者都有可能伴随歃血盟誓的仪式。对于这种容易导致社会叛乱的现象,清政府制定了严格压制的刑律,但由于社会上大量游民的存在,结拜之风禁而不止,相反,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从中发展起来。由于当时的台湾移民社会内充斥着以地缘冲突为主的各种社会矛盾,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游民——罗汉脚们便随处纠约拜把,惹事生风。风气所及,拜把已不限于流民群体,包括业主、佃户、商贩及豪强、头家在内的各色人等,莫不纷纷仿效,以应付当时社会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冲突和暴力。

通过拜把结盟,下层社会借为起事、起义的工具,豪强头家则拥为分类械斗的砝码。

“立有名目”的会党在乾隆年间的台湾社会已经多有出现。尤其是乾隆三十七年后,原先流传于福建的小刀会开始在台湾彰化县流传开来。据称:“漳泉匪类名为罗汉脚,还有三五成群,结盟拜把,遇事和人打架,其时大家就拿了小刀相帮,因此叫做小刀会”<sup>⑤</sup>。三十八年,林阿蹇(即林阿赛)、黄添等人结拜小刀会,“各置小刀一把,随带防身。凡会内与人争闹,即持刀群赴相帮。乡愚畏威惊避,是以指小刀会人为王爷,谓其大如王爷”<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黄添、林阿赛又是挑起乾隆四十七年彰化、诸罗两县大械斗的魁首。

在这种拜把结盟、“结会树党”的氛围中,林爽文耳濡目染,深受影响,还在他充任彰化县役时,他就喜欢“阴结少年无赖”,平素他时常听人说:“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sup>⑦</sup>。所以在结识严烟后,就主动要求入会。但在他入会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没有迹象表明林爽文要借天地会造反。倒是有迹象表明,林爽文拜盟结会是出于劫掠和械斗的目的。如起义军首领高文

麟供称：林爽文“原是作贼窝贼，得来银钱肯帮助人”<sup>②</sup>。杨振国供称：“这林爽文从前曾犯贼案，小的把他拿住，得钱卖放”<sup>③</sup>。至于械斗，考诸文献云：“昔日之斗，会社犹少，今各处无不会社，凡此社有斗，同会者必出械助之，因而牵连愈多”<sup>④</sup>。乾隆四十七年台湾漳泉大械斗时，应小刀会首领黄添纠约，大里杙棍首林士谦率领人众，四处焚杀。最后，林士谦等人被处极刑。

由于这两层背景，林爽文借拜把、结会之名不断巩固自己在大里杙及周边地区的“头人”地位。乾隆五十一年七、八月间，由于杨光勋添弟会案牵连大里杙庄，林爽文加快了拜盟结会纠众的步伐。八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拜盟结会”，林泮、林领、何有志、王芬等十人加入。众人“歃血饮酒，互相约誓，有难相救，有事相帮”<sup>⑤</sup>。

十一月，由于官府步步进逼，起义爆发。据林爽文供称：杨光勋案“牵连我们，一齐呈告”，彰化文武各官差人各处查办，衙役等从中勒索，“无论好人、歹人，纷纷乱拿，以致各村庄俱被骚扰”<sup>⑥</sup>。林泮、王芬等人首当其冲，林泮因房屋被差兵烧掉，“紧急起意造反”，四处纠人入会，并迭次纠林爽文一同行事。林姓族长林家齐等人怕事，将林爽文藏在山内畚箕湖地方<sup>⑦</sup>。待到刘升、林泮、王芬等人发动起义，攻击大墩汛、占领彰化后，林爽文才接替刘升扯起“顺天大盟主”旗号。

由此可见，台湾的拜把结会传统由远而近、由微而渐，最终在外部条件的激发下产生裂变，天地会也从众多名目的会党之一变成了起义者的组织工具。镇压起义后，清王朝一直在追查天地会的起源并镇压其活动。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天地会活动由一般的以“互助——抢劫”为宗旨的反社会行为，逐渐演变成成为以“反清复明”为主要信条的反政府行为——尽管其一般行为仍以抢劫为主要内容。

#### 四、分类械斗、“义民”与林爽文起义的成败

“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

显著特征，台湾的社会动乱以及每次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义民”则是某个或数个移民集团站在政府立场上对发动社会动乱或起义的移民集团实施“分类”报复的组织。以往研究林爽文起义的论著，曾注意到了“义民”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学者一般都把义民称为“地主武装”，台湾学者看法不同。刘妮玲在其《清代台湾民变研究》一书中认为：“义民乃民变事件的应生物，是自存于民间且是与民变对立的团体，义民之产生，最根本的原动力为对抗‘乱民’所加诸当地社会的焚杀抢掠行为”。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学者似乎都只是从宏观上看问题，即从农民起义、阶级分析的角度，或是“顺民”、“乱民”的角度看问题。而很少从微观上对“义民”的产生原因以及它们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应该说，“义民”不完全是阶级矛盾的结果，而是“分类械斗”的产物；“义民”不是单纯的地主武装，而主要是一些头家、绅富操纵的“分类”集团（正如“乱民”中也有许多头家、绅富充当首领一样）。分类械斗与义民问题对林爽文起义的作用不容低估。

分类械斗与其他民间械斗的共同点在于：第一，它是民间私斗；第二，它不带政治色彩（除非官方介入）；第三，它不是阶级斗争，因为各个社会群体不以阶级划分，而以族姓、分派或籍贯等进行划分，同一群体中往往有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按照不同祖籍划分阵营，这是分类械斗不同于一般械斗的主要特点。<sup>⑧</sup>关于分类械斗本身，大陆和台湾学者陈孔立、张炎、黄秀政等人都做了很精深的研究。但对于分类械斗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后人似尚未深入探究，倒是清人说过这样的话：“台匪滋事，有起于分类而变为叛逆者，有始于叛逆而分类者。官畏其叛逆，谓祸在官；民畏其分类，谓祸在民。百余年来，官民之不安，以此是”<sup>⑨</sup>。下面我们就从乾隆四十七年的漳泉大械斗来看看林爽文起义的深层背景。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彰化县荊桐脚庄演戏，三块厝漳民黄叫、黄璇“起意聚赌”，泉民廖老“赴彼压宝，指输作赢，索令赔给，黄璇不允，互相争吵”，黄璇等人将廖

老毆杀。死者廖老家属报官请验，知县焦长发未即勘验，廖诏等人便“藉命滋事”。二十六日，众泉民赴黄添家毆抢（黄添系黄璇之父，即前面提到的小刀会头目），漳人亦拦夺泉人什物，“彼此成仇”。二十八日，黄添等人准备纠约大里杙漳人抢杀番仔沟各泉庄，“声言遇见泉人尽欲杀死”，泉民谢笑、吴成等人即写备传帖，纠约泉民，帮助抵敌。

二十九日，大里杙庄头家林士谦首先率领大批人众出斗，焚烧番仔沟泉庄，“泉民出御，互有杀伤”，械斗全面展开。

大里杙庄在彰化县东二十里，前凭重溪，后靠内山番社，门户深阻，“其中腴地百里，……食不外求。以是罪魁渠首，常负险为巢穴”<sup>⑤</sup>。直接办理此案的官员之一、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说：“大里杙漳匪首先听邀攻庄，尤为起事首恶……查大里杙漳庄，林姓族大丁多，素属强悍，乡里侧目”<sup>⑥</sup>。

林士谦听从黄添纠约后，即纠集本庄及邻庄族邻林西、林阿骞（小刀会头目）出庄攻杀泉庄。一个月里，漳民攻泉民100余庄、泉民攻漳民80余庄。彰化全县“被扰大小村庄二百余处，据控杀命者已有数百命，甚至杀害把总林审”<sup>⑦</sup>。随着械斗往南蔓延，诸罗县的漳泉两籍也分庄互斗，富户翁裕光等怂恿佃户出奸杀，鹿港的泉民首领林凑等调集大批泉民防御。总计诸罗一县被焚杀村庄将近二百处。

械斗时伴随着疯狂的烧、杀、抢、奸行为，如“漳匪黄全一犯，连杀七命”；尤其是罗汉脚在械斗中的破坏作用值得注意。据载。械斗一发生，“四乡罗汉脚从而附和”，推波助澜，“在漳庄则呼泉人欲来焚抢，在泉庄则称漳人即至围杀，以至人心惶惶。小庄逃依大庄保护，其小庄房屋空虚，匪类乘机焚抢”<sup>⑧</sup>。游民——罗汉脚们这种“附和”、“煽惑”、“焚抢”的破坏习性，不仅表现在械斗中，也表现在后来的林爽文起义中。

清政府对械斗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先后处死130余人，徒流150余人，黄添、林士谦、林阿骞、许国梁（漳籍武举）、谢笑俱受极刑。但此次械斗的阴影久久笼罩在人们心头，泉民张标在托人捎回内地的信中说：“路上泉界泉行，漳界漳行，以防不测之心”<sup>⑨</sup>。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淡防厅因争抽埔租发生闽粤械斗；乾隆五十年，彰化、诸罗等地再次爆发漳泉械斗。

对于乾隆四十七年大械斗之影响，清人赵翼评论道：“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sup>⑩</sup>。

因此，分类械斗对林爽文起义的影响，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出端倪：为防备械斗而积聚力量——起义爆发，漳人大批响应——泉籍、粤籍民人成为“义民”——“义民”成为清政府镇压起义军的得力工具。

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爆发，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下彰化、诸罗、凤山诸城，人数急剧膨胀。这是因为：台湾营兵不足，统治力量薄弱；吏治废弛，贪官污吏横行，导致民怨沸腾——时人及后来论者均已指出，贪官激变是林爽文起义的直接原因；台湾移民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已经完全激化。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林爽文起义初期的雷霆万钧之势与漳籍村庄的闻风响应及起义军“胁迫”泉庄参加有关。

清方资料曾多次提到，“逆首林爽文系漳州人，其附从之徒，率皆籍隶漳属”<sup>⑪</sup>。从台湾总兵升任福建陆路提督的柴大纪进一步指出：“林爽文等系漳州人，诸、彰漳民，所到附从”<sup>⑫</sup>。由于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村庄，无不被其扰害……被贼人威胁附和顺从者，在在皆是”<sup>⑬</sup>。可见，林爽文起义队伍的壮大，与“分类械斗”造成的不同地缘集团间的严重隔阂有关，乾隆帝也承认：“此皆由从前办理械斗各案，该地方官止期就案完结，将就了事，并未彻底严办，以致刁民肆无忌惮，酿成巨案”<sup>⑭</sup>。以漳州籍为主的起义军一方，不仅将打击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同时还对平素结有仇怨的泉、粤村庄发起攻击，如闽浙总督常青奏称：“大肚等庄贼匪，焚劫泉、粤各庄”<sup>⑮</sup>。《彰化县志》记载：“泉、粤义民村庄被贼攻陷者不可胜计”<sup>⑯</sup>。出于防御、报复的目的，泉、粤各庄迅速在当地头家、绅富的组织下，拉起“义民”旗帜。

所以，起义军与“义民”的对立，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分类械斗”的烙印。

最先给起义军造成严重威胁的“义民”武

装是林湊所部（林湊即从前参与防备林士谦攻杀的泉民首领）。据载，由于此前械斗，“漳民、泉民构衅，经官兵惩创，而仇隙未解。至是林爽文破城戕官，所过漳人响应，泉人心自不安。林湊，晋江人，于是招集泉人讨贼，一时埔心、二林各庄泉民前经降附林爽文者，皆愿杀贼为义民”<sup>④</sup>。在彰化被起义军占领后的第14天，林湊即率众数千人，声言数万，又招粤民和部分清兵相助，攻克彰化，擒获守将杨振国、高文麟等人。

由于粤庄义民的加入，对林爽文起义军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在台粤人较少，平时与闽人相斗，“知其众寡不敌，不分邪正，一气联络”，往往多取胜机，又“闽人为叛民，粤人即出为义民”<sup>⑤</sup>。这种情况早在康熙末年朱一贵起义时即已出现。林爽文起义不久，南路庄大田响应，攻下凤山后，庄大田派人前往招引粤人，遭捕杀。此后山猪毛粤民一百余庄，选壮丁八千余人，分为中、左、右、前、后及前敌六堆，推举人曾中立为首，领众进攻小笃家庄、阿里港等，“牵缀贼势”<sup>⑥</sup>。如此，“义民”队伍扩大，与起义军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在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率大军渡台前，尽管台湾方面有台湾总兵柴大纪所部，以及陆续援台的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湖广总督常青等部，但因调度不当、株守不进等原因，清军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倒是各地“义民”配合小股清军四处防堵，苦苦支撑。据《钦定平定台湾纪略》记载，连福康安也不得不承认：“自逆匪滋事以来，府城、诸罗、鹿仔港等处，久被攻扰，得以固守无虞，实借该义民之力”。

起义军与“义民”的对立，从性质上来说，由于农民起义军与清朝作战这个前提，两者属于阶级斗争，但形式上仍是“分类械斗”的重演——以前的“分类械斗”是民间私斗，此时已抹上了一层“阶级对立”的色彩，并因此而变得规模更大，程度更烈。如林湊纠集义民攻克彰化后，“日出焚烧漳人庄舍”，有些未响应起义的漳庄，开始“犹心恃两端，及数被义民蹂躏，从贼心益坚”。留守虎仔坑的起义军首领陈泮、吴领等“益纠众为报复计，凡泉人庄舍，贼亦尽焚之”<sup>⑦</sup>。其他如白石湖、金

包里、大甲溪等处，漳、泉、粤人“分庄互杀”，“彼此烧毁庄社”，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所以，福康安的幕僚赵翼评论道：“贼方蜂起，漳人仗贼之势，尝凌泉人，及黄（仕简）、任（承恩）两提督率兵至，则泉人又仗官兵之势，凌漳人”<sup>⑧</sup>。随着形势的此消彼长，起义军与闽粤“义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中不难发现，无论是起义军方面，还是义民方面，分类报复之事在在显露，把义民说成是针对“乱民”的“反破坏力量”实在是一种美化。

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林爽文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分类械斗”的祸根是起义的障碍，力图将其影响控制到最低限度。他曾多次发布告示称：军中兄弟“与广东百姓如何闹事，实属不该”；由于各镇将军、股头不能约束部下，以致仇杀相继，“殊非安邦定国之政”；他说：“无论闽粤民番，皆属百姓，更当加恤”<sup>⑨</sup>。但由于“义民”的抗拒，起义军中的游民——罗汉脚的大量存在及起义军领导层的涣散无能，林在消除“分类械斗”的负面影响、分化清军阵营方面所作的努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相反，清王朝在利用“分类械斗”方面却做得有声有色，他们通过泉、粤“头家”不断发展“义民”队伍，同时对起义军内部实行分化工作，加快了起义失败的进程。

从林爽文起义的整个过程来看，在福康安率军渡台前的一年时间里，义民在对抗、牵制起义军的作用方面，与官军相比，毫不逊色。福康安渡台后，“义民”声势益壮，在镇压北路林爽文、南路庄大田诸役中，无不踊跃出力，有关文献记载甚多，兹不赘述。

“义民”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中的这种表现，一方面是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帮凶”，另一方面，则是赤裸裸的“分类”报复。从台湾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没有必要对参与镇压的泉粤义民加以贬低，也没有必要对参加起义军的漳籍民人过于拔高。这是因为：（1）如同前述，不同籍的集团在林爽文起义过程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类械斗”的重演；（2）“义民”角色在每次起义中随着起义领导者的祖籍身份而变换，正如姚莹所说：“漳泉民人素分气类。林爽文之乱，泉人为义民击贼；陈周全以泉人谋逆，漳人亦为义民败之”。事后，

“民间颇以为口实，将谋械斗”<sup>⑤</sup>。起义失败，不等于“分类”矛盾的消失，相反，新的暴力又在酝酿之中，这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中的一

种特有现象，也是我们研究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页。

② 同治《福建通志》卷87，“海禁”。

③ 魏源：《圣武记》（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336页。

④ ⑤ 姚莹：《东槎纪略》卷四，“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卷5，“陈周全之乱”。

⑥ 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肥，1990年，第625—626页。

⑦ ⑧ 《蠡测汇钞·问俗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37页、第138页。

⑨ 康熙《台湾县志》卷10，“文艺志”。

⑩ 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⑪ David Ow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⑫ ⑬ “严烟供词”，见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0—112页；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0—262页。

⑭ ⑮ ⑯ 《天地会》（一），第154页；第155页；第241页；第153—154页。

⑰ ⑱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8；卷54。

⑲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六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折。

⑳ 《天地会》（一），第162页；《明清史料》戊编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22页。

㉑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折。按，后来的天地会为了逃避清廷追拿，屡有变名“添弟会”者，与此处添弟会不同。

㉒ 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㉓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五日上谕。

㉔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李永祺奏折。

㉕ 《明清史料》戊编上册，第523页；《天地会》（一），第171页。

㉖ 刘妮玲：《清代台湾民变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历史研究所专刊（9），台北，1983年，第306页。

㉗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㉘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福建将军永德奏折。

㉙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折。

㉚ ③ “林爽文供词”，见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军机档38808；同见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第251页。

㉛ ④ ⑤ ⑥ 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第251页；第253页；第220—222页。

㉜ 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2，第14页。

㉝ 参见孔立：《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若干问题》，载《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3期。

㉞ ⑦ 《噶玛兰厅志》卷5，风俗上；《蠡测汇钞·问俗录》，第138—139页。

㉟ ⑧ 佚名：《平台纪事本末》。

㊱ 《明清史料》已编下册，第1964—1968页。

㊲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台湾镇总兵金蟾桂奏折。

㊳ “张标家信”，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第31页。

㊴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第133—134页。

㊵ 《清高宗实录》卷1272；《天地会》（一），第204页。

㊶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奏折。

㊷ 《天地会》（四），第238页。

㊸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上谕。

㊹ 道光《彰化县志》杂识志。

㊺ 《清代台湾农民起义资料选编》，第263—264页。

㊻ 同治《福建通志》卷268；卢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兵事上，“剿平庄逆纪略”。

㊼ 赵翼：《论台湾要害》，《清经世文编》（下），中华书局，1992年，第2077页。

（作者刘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邮编210093）